

经济计算与组织的限度

[美]彼特·G. 克莱因

李陈华 译

内容提要 :本文着重阐明奥地利主义对企业理论的特殊贡献,这些贡献在奥地利主义文献的内部和外部都被大大忽视了。米塞斯的经济计算的概念应该被置于组织性质及设计的奥地利主义研究的中心。第三代、第四代奥地利主义经济学家对市场以及对中央计划下的资源配置困难有着独到见解,但他们一直是含蓄地去理解组织经济学。罗斯巴德对企业规模的分析首次明确采纳了罗纳德·科斯1937年提出的分析框架,这一框架是大多数现代企业理论的分析基础。米塞斯和罗斯巴德不仅预见现代文献的部分内容,而且还有重大创新,尽管这还没有被普遍认识到。

关键词 :奥地利学派 经济计算 组织的限度

经济学家们对教科书中的企业模型越来越感到失望。在中级微观经济学中,“企业”是一个生产函数,像一个神秘的“黑箱”,黑箱里的情况被正统经济理论排斥在外(而被认为是管理学、组织理论、产业心理学等次级学科的研究内容)。尽管教科书中的模型在某种意义上也有可取之处,但已被证明不能解释许多实际商业行为。经济学家们开始抛开企业的生产函数观点,转向另一类文献,把企业看作一种组织,认为企业本身就应该成为经济分析的对象。这些新文献是所谓的“新制度经济学”中发展最快的部分^①。其中的新观点大大提高和丰富了我们对企业及其他组织的理解。

本文着重阐明奥地利主义对企业理论的特殊贡献,这些贡献在奥地利主义文献的内部和外部都被大大忽视了。特别地,我认为米塞斯(Mises)的经济计算(economic calculation)的概念——企业家根据消费者需要去调整生产结构的手段——应置于关于组织性质及设计的奥地利主义研究的中心(forefront)。关于经济计划,在社会主义计算辩论(socialist calculation debate)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奥地利主义观点。

第三代、第四代奥地利主义经济学家对市场以及对中央计划下的资源配置困难有着独到见解,但他们一直是含蓄地去理解组织经济学。事实上,罗斯巴德(Rothbard)在《人、经济与国家》(1962)一书中对企业规模的分析首次明确采纳了罗纳德·科斯1937年提出的分析框架,

作者简介 :彼特·克莱因(Peter G. Klein)是美国乔治亚大学经济学助理教授。作者感谢 Don Boudreaux、Jerry Ellig、Sandy Klein、Dick Langlois、Joe Salerno 和 Oliver Williamson 提供了有益的评论和建议。译者:李陈华,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博士生,湖南商学院经济管理研究所讲师。

^①关于新制度经济学和企业理论的总体观点,参见科斯(1991)、弗鲁伯滕和里查特(Furubotn and Richter, 1991)、霍姆斯特罗姆和梯勒尔(Holmstrom and Tirole, 1989)、兰格罗易斯(Langlois, 1994b),以及《制度与理论经济杂志》(1993年3月, 1994年3月, 1995年3月)。对于有关经验研究的综述,参见希兰斯基和克莱因(Shelanski and Klein, 1995)。

这一框架是大多数现代企业理论的分析基础。米塞斯在《人类行动》(1949)一书中针对金融市场作用的讨论,预见了亨利·曼恩(Henry Manne)1965年关于公司控制权市场的开创性论文,以及学术界最近对金融学作为经济学基本组成部分的承认。

米塞斯和罗斯巴德不仅预见现代文献的部分内容,而且还有重大创新,尽管这还没有被普遍认识到。他们的贡献虽然不属于完全清晰的企业理论,但仍然值得注意和发展,对研究这些问题的奥地利主义学者来说更是如此^①。这些贡献包括:罗斯巴德用计算问题去分析企业的限度;米塞斯讨论了市场经济中的金融市场如何限制经理自由决断(managerial discretion),以及如何完成最终的资源配置任务。

一、教科书中的企业理论

在新古典经济理论中,根本不存在企业之类的事物。企业是一个生产函数或生产可能性集,即一种把投入转换成产出的手段。给定可得的技术、投入品价格向量和需求表,企业的生产计划必须在技术上可行的约束下实现货币利润最大化。这就是关于企业的所有问题。企业被模型化为一个行为人,面临一系列相当简单的决策:产出多少,每种要素的数量多少,等等。当然,这些“决策”其实根本不是决策,它们是琐碎的数学计算,隐含于基本的事实资料中。从长远角度来看,企业还可以选择最优规模和产出组合,但这也由生产函数的特性所决定(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关联经济)。简而言之:企业是一组成本曲线,“企业理论”是一个计算问题。

这些模型当然不能真实地描述现实中的工商企业,要理解作为法律实体的企业的规模和范围,我们就必须把视野拓宽到教科书以外。

二、科斯与交易成本

罗纳德·科斯在其1937年的著名论文《企业的性质》中,首次解释了组织的边界不仅依赖于生产技术,而且依赖于交易活动的成本。科斯主义框架在威廉姆森(Williamson, 1975; 1985; 1996)、克莱因、克劳福德和阿尔奇安(Klein, Crawford and Alchian, 1978),以及格罗斯曼和哈特(Grossman and Hart, 1986)那里得到了发展,其认为在企业内组织交易或在公开市场上组织交易的决策依赖于内部交易与外部交易的相对成本。市场机制必然产生某些成本:发现相关价格、协商和执行合约,等等。在企业内部,企业家可以自己协调这些活动,减少了这些“交易成本”。但是内部组织带来了另一类交易成本,或者叫做信息流动、激励、监督和绩效评价的问题。于是,企业的边界决定于外部交换与内部交换的相对交易成本在边际上的权衡。在这种意义上,企业边界不仅依赖于技术,而且依赖于组织因素,即依赖于签约的成本和收益。

马克·瑞欧(Mark Roe, 1994, p. vii)出色地概括了最近经济学家们对企业问题的思想转变:以前,经济理论把企业看作机器、技术、存货、工人和资本的集合。把这些投入倒进一个黑箱子,再搅拌一下,人们便可以得到产品和利润产出。现在,对企业的理论解释越来越多了,并且大都把企业看作一种管理结构。如果经营者能够成功地协调企业的活动,企业便会成功;如果经营者不能有效地在人和投入品与当前技术和市场之间进行协调和匹配,企业便会失败。处于企业最顶层的是企业的股东、领导者和高层管理人员之间的关系。如果那些关系失调了,企业

^①我记得最近的研究者有鲍焦克斯和霍尔康伯(Boudreaux and Holcombe, 1989)、弗斯(1993a, 1993b, 1993c)、兰格罗斯(1988, 1992a, 1992b)及敏科勒(Minkler, 1993a, 1993b)。

就很可能跨掉^①。

在这种新的导向下,经济理论在财务、会计、管理及其他领域里的作用越来越大,而这些领域以前被置于经济学视野之外。

三、经济计算与企业规模的限度

不幸的是,关于企业理论的经济文献尽管日益增加,但大多集中于市场交换的成本,而很少注意内部交换的成本。然而,这种新研究必须对企业规模限度提供一个圆满的解释(Williamson, 1985, chap. 6)。用科斯的话说,“为什么企业家不多组织一项交易或少组织一项交易?”或者,更一般地,“为什么不是所有的生产都在一个大企业里进行?”(Coase, 1937, pp. 4243)。企业限度的理论也许是新的组织经济学中最困难和最欠发展的部分。通过应用米塞斯的社会主义条件下经济计算的不可能性定理,奥地利主义理论对这一问题具有明显的贡献。罗斯巴德已经阐明,根据实际价格进行经济计算的需要,不仅解释了社会主义条件下中央计划的失灵,而且给出了企业规模的上限。

(一)社会主义计算辩论:一个短评

为了解米塞斯在那场计算辩论中的地位,我们必须认识到他的论点不是专门(甚至不是主要)针对社会主义,而是关于资本品价格的作用。企业家基于未来价格的预期和当前价格中所包含的信息而作出有关资源配置的决策。为了获得利润,他们需要所有价格信息,不仅包括消费品价格信息,而且包括生产要素价格信息。若没有资本品市场,这些商品便没有价格,企业家因此无法对这些要素的相对稀缺性作出判断。简而言之,资源不能被有效率地配置。因此,在任何环境下——不论是不是社会主义——只要生产要素没有市场价格,该要素的潜在使用者就不能作出理性的使用决策。从这种角度看,米塞斯的观点实际上是:市场经济有效配置资源需要有一个运转良好的资本市场。然而,由于学者们对米塞斯的“真正所指”存在不同理解,所以有必要在这里对那场辩论作一简评。

根据标准的解释^②,在1920年以前,社会主义理论家大都注意马克思提出的避免“乌托邦”式推测的警告,却很少注意到社会主义经济在实际中如何运行。后来,当时主要以金融理论家闻名的米塞斯发表了他那篇轰动性的论文,后被翻译为《社会主义共和国中的经济计算》(1920)^③。米塞斯声称,若没有生产工具的私人所有权,就没有资本品的市场价格,因此决策者就无法评价各种生产技术的相对效率,从而无法作出决策。米塞斯指出,即使存在消费品市场,中央计划者也不能把有意义的价格“归因于(impute)”生产消费品的资本品,这预见了他后来的“市场社会主义”观点。简而言之,若没有资本品和消费品的市场催生价格,即使最具奉献精神的中央计划者也将发现,根据消费者需要去配置资源是“不可能的”。

对米塞斯观点作出最重要的回应是弗雷德·泰勒(Fred Taylor, 1929)、H. D. 狄根森(H.

^①奥地利主义学者还要加上一点,资本、土地和劳动——包括“管理劳动”——不是仅有的投入品或生产要素。企业家才能或风险承担能力,以及罗斯巴德(1962, pp. 538—41)所说的所有权或“决策要素”,也是生产要素。关于这一点,也可参见后文介绍的米塞斯(1949, pp. 291—52, and pp. 66—68)的观点。

^②关于计算辩论的“标准解释”,见熊彼得(Schumpeter, 1942, pp. 172—86)和博格森(Bergson, 1948)。我对“修正主义观点”的讨论参照了霍夫(Hoff, 1949)、萨勒诺(Salerno, 1990)和罗斯巴德(1991)。

^③提出类似于米塞斯观点的其他著述包括N. G. 皮尔逊(N. G. Pierson)的《社会主义社会中价值问题》(1902)和马克思·韦伯(Max Weber)的《经济与社会》(1921)一书中的部分章节。

D. Dickinson, 1933) 阿巴·雷勒 (Abba Lerner, 1934) 和奥斯卡·兰格 (Oskar Lange, 1936—37) 发展的所谓“市场社会主义”或“数学解”,这一回应得到了绝大多数经济学家的认同。在市场社会主义系统中,资本品是集体财产,但个人可以自由地拥有和交换最终产品和服务。该系统是这样运行的:首先,中央计划委员会为消费品和资本品任选一组价格;各类国有企业的经理以该价格去生产一个最优产量,使每一最终商品的边际成本等于它的价格,然后再选择一个使该产量下的平均成本最小的投入组合;然后,允许消费品价格波动,并且中央计划委员会根据最终产品的短缺和过剩调整资本品的价格。于是,通过一个基本上等同于资本主义企业经理那样的“试错”过程,资源将根据供给和需求进行配置。

市场社会主义不仅可以被看作是回答了米塞斯的计算问题,而且可以看作是回答了哈耶克 (Hayek) 和里昂·罗宾斯 (Lionel Robbins) 所提出的“可行性 (practicality)”观点。在哈耶克和罗宾斯看来,社会主义组织的失灵是由于机制设计问题,因为计划者不能获得关于消费者偏好和资源可获性的完全信息,从而不能有效配置资源。更进一步,即使计划者通过某种方式能够获得这些资料,也需要花几年时间去计算现代经济中的数百万种价格。兰格-雷勒-泰勒方法声称通过试错可以解决偏好显示问题,因此实际计算是不必要的^①。

随着市场社会主义被广泛接受,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计算辩论的“正统脉络 (orthodox line)”。阿布拉姆·博格森 (Abram Bergson) 的著名综述《社会主义经济学》(1948) 和约瑟夫·熊彼特 (Joseph Schumpeter) 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1942, pp. 172—86) 对此作了完整的总结。根据这一脉络,是米塞斯首先提出社会主义条件下经济计算的可能性问题,然后哈耶克和罗斯巴德“撤退”到社会主义计划在理论上能够计算,但实际中的信息问题将使这一计算太困难;再后,市场社会主义者证明,计划者可以采取试错方法,并不需要完全信息。因此,争论还在继续,经济理论本身不能对中央计划有效性作出任何结论,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选择必然是纯政治性的。

(二) 计算与激励

随着激励和信息理论的发展,关于社会主义计划的正统脉络近几年来有所修正。现代激励和信息理论的典型观点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差异在于这两种系统中不同的激励特征。中央指挥型系统被认为比市场系统具有更高的代理成本——经理自由决断、偷懒等 (比如, Winiecki, 1990)。其实,兰格自己就警告过,“社会主义真正的危险是经济生活官僚化” (Lange, 1936—37, p. 109)。

然而,米塞斯对社会主义的挑战并不在于众所周知的激励问题^②。姑且假定,在中央指挥下和在市场系统中,每个人都同样地努力工作。现在仍然存在这样的问题,即中央计划委员会将发布什么样的确切指令。委员会必须决定应该生产什么产品和服务,每种产品和服务生产多少,生产每种最终产品需要什么中间品投入,等等。在一个复杂的现代经济中,生产是多阶段

^①实际上,兰格在几年后声称,甚至市场社会主义也会随着高速计算机的出现而过时,这种计算机能够为中央计划者迅速地求解巨大的联立方程组系统。“如果让我今天重写我 (1936) 的论文,我的任务将更加简单。我对哈耶克和罗宾斯的回答将是:有什么麻烦呢?让我们把联立方程组输入电子计算机,不用一秒钟便可以得到解。市场过程笨重迟钝 (tâtonnements), 显得太老套了。事实上,市场过程可以被看作是前电子时代的计算设备” (Lange, 1965, pp. 401—2)。显然,兰格并不是很了解计算机。在 1950 年代任职波兰经济委员会主席期间,兰格从来就没有把市场社会主义付诸实践 (见 Lange, 1958)。

^②米塞斯在 1920 年的论文中用了一个部分去论述“公社事物中的责任和激励”,但他明确表示这对社会主义计划者来说是一个次要问题,而不是主要问题。

的,资源配置依赖于资本品货币价格的存在,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这些价格形成于企业家对生产要素的动态竞价过程。这一过程不能用投入—产出分析、计算机模拟或任何其他形式的人工市场来加以复制。米塞斯的主要观点是:社会主义失败的原因在于,决策者必须知道所有这些要素的有意义的价格,以便在许多可能的要素组合中作出选择。“如果不使用每时每刻在市场上被决定的货币价格结构,以对生产的收益和成本进行计算和比较,那么人脑只能考察、评价和指挥像原始家庭经济那样小范围的生产过程”(Salerno, 1990, p. 52)。

计算与激励之间的差异是重要的,因为关于组织设计的现代经济学文献——从企业规模的交易成本解释,到官僚科层的公共选择理论,再到关于市场社会主义和“软约束”(Kornai, 1986)的最近研究——主要集中于激励问题(可能受到兰格关于官僚科层的著名警告的启发)。激励理论研究的是,在一个特定关系中,委托人如何使代理人去做合乎委托人意愿的事。然而,米塞斯的问题不同:委托人如何知道告诉代理做什么?也就是说,应该从事什么样的活动?应该作出什么样的投资?哪条产品线应该扩张,哪条产品线应该收缩?计算辩论中产生的思想意味着,当组织大到足以使所有活动都在内部进行时——以至于没有外部市场作为参照——将同时面临计算问题和激励问题。

有人对米塞斯的观点作了如下描述:我们没有理由期望,社会主义企业的经理会像与企业利益唇齿相关的私人企业经理一样地“玩市场游戏(play market)”。这可能是米塞斯的观点。但米塞斯主要关心的却是,企业家没有获准“从事投机和投资”(Mises, 1949, p. 705)。他坚持认为,这不是下属经理(代理人)的激励问题,对他们来说要解决的问题是给定的,而是投机者和投资者(委托人)的激励问题,他们决定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兰格、雷勒和泰勒以严格静态的新古典视角来看待市场,这时所有的系统参数都被给定,剩下的只是一个计算问题。其实市场经济是一个动态的、创造性的演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企业家——利用经济计算——使产业增长和萎缩,导致新的、不同的生产方法被尝试,另一些生产方法被放弃,不停地改变可获产品的范围。在私人财产所有权缺失的情况下,损失掉的正是市场资本主义的这些特征,而不是代理人努力工作的激励。

事实上,像前苏联经济那样的传统的指令型经济,看来只能模仿市场经济从前已经完成了的那些任务,而不能确定和执行最初的任务。

当中央的优先任务涉及快速赶超时,(苏联)系统特别有效,因为在那种情况下,可以参照工作模型(working model)去解决知道做什么、什么时候做、如何做、是否被正确地做了等问题,可以利用杰钦科隆(Gerschenkron)所说的……“劣势(backwardness)的优势”……伴随这些优势的是系统内在的本质缺陷。当系统追求几个优先目标而不顾次要领域里的牺牲和损失时,最终负责的那些人不能知道这种成功是否值得。中央当局缺乏信息和实物能力去监督所有的重要成本——特别是机会成本——然而,给定该系统的逻辑,只有他们才真正有兴趣去了解这些成本。(Ericson, 1991, p. 21)

不通过经济计算,便无法确定任务是否已被有效率地完成。因此,没有实物和金融资本市场——其决定将要完成什么任务以及是否已被充分地完成——经济系统便难以产生新事物,从而必须依赖于外部参照去确定做什么。当然,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能够存在的唯一原因就是,他们从来没有完全在世界范围内建立社会主义,因此他们可以参照世界市场价格去确定他们内部买卖商品的隐含价格(Rothbard, 1991, pp. 73—74)。用米塞斯的话说,这些经济

不是孤立的社会主义系统。它们运行于价格体系仍然有效运转的环境中。它们能够基于国外价格进行经济计算。若没有这些价格的辅助,它们的行动将变得盲目和无计划。如果它们能够计算、记帐以及准备它们常谈到的计划,仅仅是因为它们能够参照这些国外价格。(Mises, 1949, pp. 698—99)

如在下文中将要看到的,企业的情况类似:需要外部市场价格去计划和评价它的行动。

(三) 罗斯巴德与组织的限度

罗斯巴德对企业理论的主要贡献是:他把米塞斯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资源配置问题的分析扩展到垂直一体化和组织规模的研究中。罗斯巴德在《人、经济与国家》中写道,“达到某一点时,企业规模决定于成本,如教科书中的模型所示。但是‘最终限制企业相对规模的是,针对每一种要素都必须存在市场,这样企业才有可能计算其利润和损失’”(Rothbard, 1962, p. 536)。这一观点的关键在于“隐含成本”的概念。要素服务的机会成本的市场价值——即罗斯巴德所说的“隐含收入的估计”——只有存在那些要素的外部市场时才能被确定(pp. 542—44)。例如,如果企业家自己管理他的业务,那么企业的成本中就必须包括他自己劳动的机会成本,如果企业家不能度量自己劳动的机会成本,那么他的平衡表将更加不精确。

在具有多阶段生产的企业中,也会存在同样的问题。大型的一体化企业被典型地组织成一些半自主业务单位或“利润中心”的集群,每一单位或部门专业化生产某一特定的最终产品或中间产品。企业的中央管理层利用各业务单位的隐含收入(在部门利润和损失的财务报表中反映出来),在各部门之间配置实物和金融资产。盈利多的部门被扩张,盈利少的部门被收缩。

像中央计划经济一样,企业需要市场信号来指导其行动;没有这些市场信号,企业便不能生存。注意,一般来说,罗斯巴德描述的只是企业的最高边界,而不是扩大企业活动的附加成本(当存在外部市场参照时)。然而,一旦企业的扩张取代了至少一个外部市场(指某一个中间品外部市场——译者),经济计算问题便会出现。当越来越多的外部市场消失时,这种计算困难变得愈加严重,因为随着不可计算性的领域增加,非理性、不当配置、损失、贫困等问题将变得越来越严重”(p. 548)。换句话说,企业受到内部配置商品的外部市场存在程度的限制。若没有这些商品的市场价格,企业就必须依靠相对成本较高且没有效率的方法去确定自己的会计价格,以完成内部计算^①。

重要的是,在《人、经济与国家》中,罗斯巴德正是在上述观点上开始了对社会主义计算辩论的讨论,明确指出这两个问题是内在相通的。社会主义经济不能计算的原因不在于社会主义本身,而是因为一个代理人拥有和指挥着所有资源。在1976年的论文《路德韦格·冯·米塞斯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经济计算》中,罗斯巴德对此作了扩展,他解释道:

有一个至关重要却被忽视了领域,在那一领域里,米塞斯关于经济计算的分析需要被扩展。因为在深远意义上,这一理论根本不是关于社会主义的!相反,它适用于任何这样的情形:一个集团对生产工具的控制已遍及一个巨大的领域——或者,在严格意义上,遍及整个世界。针对这一特殊的社会主义问题来说,这种统一控制是来自社会主义的专制剥夺,还是来自自由市场的自愿过程,都无关紧要。米塞斯理论集中考虑的并不是政府相比于逐利的市场过程而存

^①这并不意味着,因为外部价格对大企业的有效运转是必要的,所以在外部市场“浓厚的(thick)”或发展更好的行业里,企业必然更大。相反,大企业往往出现在市场发展不好或受到政府干预的行业里;这样的环境有利于企业家在内部协调活动。然而,这些企业仍然受到需要某种(some)外部市场参照的约束。

在大量的非效率,而是资本品市场已经消失的事实。这意味着,正如社会主义中央计划不能进行经济计算一样,没有一个大企业能够拥有和控制整个经济。米塞斯的分析适用于任何这样的情形:资本品市场在一个复杂的产业经济中已经消失,无论这是因为社会主义,还是因为大型兼并而成为单个大企业(One Big Firm)或单个大卡特尔(One Big Cartel)。(Rothbard, 1976, p. 75)

米塞斯的分析因此适用于特定资本品市场缺失的任何情形,因为这时企业已变得非常大,以至于成了该资本品的唯一生产者 and 使用者。如前所述,这种企业是不能生存的。

令人吃惊的是,罗斯巴德对米塞斯的扩展在奥地利主义文献中基本上没有引起注意,尽管这种观点在《人、经济与国家》(p. 536, p. 543, p. 547—48 和 p. 585)中出现了四次,并且在1976年的论文中又出现了^①。这种观点需要进一步发展和精炼,这将是一项有益的研究,因为关于企业规模的现代文献对组织的限度缺乏一个充分的解释。罗斯巴德的分析还意味着商业战略领域里的一种研究思路:所有其他情况相同时,在长期来看,能够利用基于市场的转移价格的企业,将比利用行政的或内部协商的转移价格的企业,表现得更好^②。但这方面的经验研究很少,尽管可能出现一个“奥地利主义战略学派”(Jacobson, 1992)。然而,已经引起极大关注的相关问题是,很难在各部门之间分配一般管理费用或固定成本。如果一种投入品基本上是不可见的(或不可排他的),那么就无法计算某一特定部门所使用的那部分投入品的机会成本(见罗杰森[Rogerson]1992年对这些问题的讨论^③)。因此,一般管理费用高的企业相对于能够在各业务单位间更精确地分配成本的企业,具有劣势。事实上,在成本会计文献中,已有人开始讨论“市场模拟会计”(Staubus, 1986),认为企业可以基于观测到的市场价格和相关信息,通过市场模拟会计去确定某一价格,使其等同于资产在活跃的市场上交易的价格。企业规模限度问题上的罗斯巴德主义观点意味着,市场模拟方法将会成为一种有用的会计技巧。

罗斯巴德在1976年的论文中讨论企业规模限度时,采纳了明显的科斯主义框架。罗斯巴德说他自己的分析方法

可以扩展科斯教授对企业规模的市场决定因素的著名分析(或者说,对企业使用内部计划与使用交换和价格机制的相对程度的著名分析)。科斯指出,这两种模式都具有递减的收益和递增的成本,用他的话说,这导致了自由市场系统中的一个“最优的计划数量”。我们要补充的是,只要资本品市场开始消失,内部公司计划的成本就立即变得极高(prohibitive),所以自由市场最优永远不会是一个大企业取代全世界的市场,也不会是任何特定市场的消失从而那种产品或资源的经济计算的消失。(Rothbard, 1976, p. 76)

这值得注意,因为甚至到了1972年,科斯仍然在说他1937年的论文“引而不用”(Coase, 1972, p. 62)。阿尔奇安和德姆塞茨的《生产、信息成本和经济组织》一文在1972年才发表,威廉

^① Lavoie 在他的《竞争与中央计划》(1985, p. 62n)一书中简要解释了罗斯巴德的分析。在评论罗斯巴德1976年的论文时,弗莱兹·马克卢普(Fritz Machlup)说自己被中央计划者的问题与企业的问题之间的类比“深深吸引”,并称之为“一个在我的几部著作中都努力推销的观点……但不幸的是,总是不太成功”(Machlup, 1976, p. 114)。在论述“人工”转移价格问题时,他引用了一本早期的书(Machlup, 1934, esp. pp. 209—14)和一篇后来的论文(Machlup, 1974, esp. pp. 42—45 and 52—54),都是德文版。哈耶克在《价格与生产》(1935b, p. 63)一书中讨论垂直一体化时也预见了一种观点。

^② 这一思路对于研究创新具有有趣的含义。由于创新型企业更有可能使用独一无二的中间产品,所以创新在带来收益的同时也会导致更严重的内部扭曲的成本。因而经济计算是创新型企业必须克服的另一道障碍。

^③ 米塞斯(1944, p. 32)认识到了分配一般管理费用的问题,认为这可能与部门会计成本可以反映“真实”成本的观点不相符。

姆森的《市场与科层》一书在1975年才出版。因此,罗斯巴德也是扩展科斯主义观点的最早的作者之一。

四、经理自由决断与金融市场^①

如上所述,当前对现代企业理论的许多研究都集中于代理问题。在什么条件下经理能够采取自由决断的行为?可以设计什么规则或机制去结合经理与所有者的利益?若没有有效的规则,经理将采取什么行动?早期的应用是所谓的现代公司中“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伯利和米恩斯(Berle and Means, 1932)争辩道,现代企业不是由股东这样的所有者经营,而是由拿薪水的经理经营,经理的利益包括执行官额外津贴、声望之类的报酬,这与股东的利益不同。如果公司股票被分散持有,那么单个股东便没有足够的积极性去(耗费成本地)监督经营决策,因此自由决断得以盛行,导致企业市场价值的损失。

亨利·曼恩在《吞并与公司控制权市场》一文中的回答是,只要存在一个活跃的公司控制权市场,经理的自由决断就会受到限制。当经理采取自由决断的行为时,企业的股价将下降,导致接管及随后对在职经理的替换。因此,尽管经理在企业日常工作中拥有巨大的自主权,但股票市场对他们的行为施加了严格的限制^②。

在米塞斯的《人类行动》(1949)中区分所谓“利润管理”与“官僚管理”的那一节(Mises, 1949, pp. 308—11),也可见到曼恩论文的主要见解。米塞斯的确承认,公司的工薪经理在企业日常工作中有非常大的自主权。但是对企业的资源配置作出最终决策的还是股东,因为他们可以买卖股票:

(伯利和米恩斯)教义完全忽视了资本和货币市场,即股票和债券交易(其最贴切的称呼就是“市场”),在引导公司业务时的作用……资本家可以利用普通股、优先股以及公司债券的价格变化,最终控制资本的流动。资本和货币市场上的投机以及针对大额商品交换的投机所决定的价格结构,不仅决定了每种公司业务的经营能够得到多少资本;而且创造了某种关系状态,经理必须根据这种关系来仔细调整其经营行为。(p. 303)

米塞斯并没有明确地把接管机制本身当作资本家实施控制的手段但他的主要观点是清晰的:市场系统真正的基础不在于产品市场、劳动市场或经理市场,而在于资本市场,企业家判断和决策只有在资本市场上才能得以实现^③。

如上所述,米塞斯对金融市场重要性的分析,也是他在《人类行动》中最后反驳兰格、雷勒和其他社会主义者对其计算观点的批评的关键之处(Mises, 1949, pp. 694—711)。他争辩道,市场社会主义者不能理解,市场系统所执行的主要任务不在于消费品定价,而在于资本在各行各业的配置。社会主义者的分析焦点在于给定资本结构中的生产和定价决策,从而忽视了资本市

^①这一部分基于克莱因(Klein, 1994, pp. 397—98)。

^②还存在其他机制可以限制经理的自由决断活动,如经理市场本身;关于这一点,参见法玛(Fama, 1980)。威廉姆森(1975)认为,资本市场作为一种外部控制设施,倾向于比“M型”结构等内部设施的效率更低。法玛的、曼恩的以及其他几篇重要的有关这一问题的论文,都被收进普特曼(Putterman, 1986)编的论文集中。

^③罗斯巴德(1962, p. 538)作了类似的描述:“受雇经理可以成功地指挥生产或选择生产过程。但生产的最终责任和控制必然取决于所有者,取决于其财产要等到产品出售之后才能实现的商人。正是所有者决定投入多少资本和投资于什么样的具体生产过程。特别地,正是所有者才必须选择经理。因此,最终决定财产如何使用以及由谁来使用的人,也正是所有者,而不是任何其他的人。”

场的关键作用。罗斯巴德(1993)年认为,可以对教科书进行同样的批评,在企业的生产函数模型中,资本是给定的。“新古典微观理论谈论‘经理’把生产推至 $MR = MC$ 的那一点,而从来不说是谁或什么把资本配置给他们(指经理——译者)。简而言之,新古典理论隐含地假定,一个固定的资本量配置给了经理……经理只是用这些资本投资于自己的企业而不是其他地方。因此得出荒谬的结论,即每个企业的经理将努力攫取最后一份利润,把生产推至 $MR = MC$ 的那一点。”幸运的是,关于合约关系的交易成本决定因素的新文献,已经开始把资本带回到公认的微观理论中。

最后,针对伯利-米恩斯教义,米塞斯在《人类行动》中解释道,“全能的(omnipotent)经理阶层的出现不是自由市场经济的现象,而是政府政策的结果(Mises, 1949, p. 307)。在该书中,米塞斯扩展了他早期在《官僚主义》(1944)一书中的分析,在早期的那本书中,他批评了企业增大必然导致官僚主义的观点。米塞斯把官僚主义想象为与逐利(profit-seeking)相对的规则遵循(rule-following)行为。他用“官僚主义管理”这一术语来表示对没有市场现金价值的活动的治理(govern)。只要企业的投入和产出被买卖,企业的中央管理层就可以获得市场价格中的信息,评价企业内各分部和部门的效率。于是,企业就可以让下属经理对日常经营决策拥有广泛的自由决断权^①。如果组织生产一种没有市场价格的商品或服务——比如,政府机构的产出——那么下属经理必须得到如何完成任务的具体指示。

米塞斯争辩道,私人企业中的经理可以自由地作出日常决策,并不会使企业变得“官僚主义”。“如果其管理层没有受到政府的干预,任何一个逐利的企业,无论它有多大,都不会倾向于变成官僚主义。官僚主义僵化的趋势并不是商业演进的必然结果,而是政府介入商业的结果”(Mises, 1944, p. 12)。在这里,米塞斯的意思是,政府干预妨碍了企业家的经济计算以及企业家利用价格去约束经理的企图。米塞斯给出了三个例子(pp. 64—73)税收和价格管制,它们影响了公司利润(扭曲了一个重要的经营业绩信号);法律,它们影响了雇佣和提升(比如,需要雇佣公关、法律和会计人员去应付政府报告要求);以及专断的反托拉斯或管制活动的普遍威胁,它们导致企业家必须变得精于“外交和行贿”(p. 72)。

五、结 论

本文目的在于,凸显奥地利主义对企业理论的一些贡献,并提出其未来研究方向。特别地,罗斯巴德所提出的对中间产品市场的需要,以及这种需要如何限制组织规模和范围的观点,值得进一步发展。这也许会比其他奥地利主义传统中的研究更富有成效。

(责任编辑:周红云)

^①在《官僚主义》的第一章“关于利润管理和企业家利润的来源”中,米塞斯非常清楚地阐释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经济计算,以及这种经济计算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不可能性。“生产要素通过其价格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企业家发出警告:别碰我,我要去满足另一个更紧迫的需要。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这些生产要素哑巴了”(Mises, 1944, p. 29)。米塞斯还对自制—或—购买决策作出了与科斯非常类似的讨论,尽管他没有引用科斯的论文(p. 33)。